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理论要义与实践指向^{*}

丁任重

【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历史、理论与实践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论、重点论、开放论与方法论，强调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着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注重系统集成。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以着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为关键任务，并以切实保障国家安全为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也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与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 全面深化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治理现代化

作者简介： 丁任重（1959-），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7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着力提升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在多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效释放了社会活力和创新动力，提高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深刻把握改革规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形成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这一系列成果不仅为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而且为深入理解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与研究。

当前学界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等方面。逢锦聚等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标，并提出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置于突出位置，突出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及其对体制机制的完善^①。谢地等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层面论证了推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22XKS015）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逢锦聚、冯泓铭：《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5期。

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应在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着重改革国家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的上层建筑^①。王立胜进一步强调了系统观念在改革中的必要性，认为系统观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范畴，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积累的宝贵经验^②。宋斌等则从战略、理念、政策和保障四个维度探讨了如何通过系统集成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并指出系统集成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③。

学界进一步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聚焦于其形成过程、核心要义、思想内涵及方法论等方面进行研究。周利生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与理论贡献，认为这一论述源于马克思主义改革思想，既继承了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又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创新性发展^④。韩保江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从“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什么是全面深化改革”“怎样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如何保障全面深化改革”等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⑤。刘嗣方重点探讨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的重要论述，分析其涵盖的根本保证论、道路方向论、目标主轴论、人民中心论等十个方面，并指出其构成了一个完整且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涉及根本保证、逻辑起点、立足基点等多个方面^⑥。

综上所述，学界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研究呈现多维度、多层次的特点，既有对其内涵本质的论述，也有对实践路径的探讨，更有对其价值贡献的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对于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重要性，系统把握其内在规律和重点任务，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逻辑、理论要义与实践指向，旨在为构建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体系提供更加系统和全面的理解框架，以期为新时期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借鉴。

一、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历史逻辑

1. 全面深化改革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要求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并与之相适应；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并与之相适应。因此，在社会生产力的作用下，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会或快或慢地发生改变并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如此。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总体上是社会生产力

① 参见谢地、孔晓：《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及其着力点》，《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6期。

② 参见王立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10期。

③ 参见宋斌、王公龙：《系统集成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进路》，《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④ 参见周利生：《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形成与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⑤ 参见韩保江：《论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基本问题》，《党的文献》2023年第2期。

⑥ 参见刘嗣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方法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与多维价值》，《改革》2023年第1期。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发展的产物，也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制度也需要不断改进与完善，才能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必然要求。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党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加快经济建设，并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1978年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伟大事业。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依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①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九二年提出，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②为什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因为在推进这一新的事业过程中，既要改革不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又要建立能够促进新时代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③

2. 全面深化改革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重要依据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径，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而高质量发展必然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

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78年以来，我国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③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入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要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有效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障碍，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①

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综合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发展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②。由此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变革为动力，以提高质量、效益、效率为目标，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为保障，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③。因此，通过科技体制的改革，包括管理方式、运行机制、分配制度、激励机制的创新，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可以不断促进和带动我国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形成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宏观环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与路径，而它的实现与落实，还需要在政策措施、考核制度、指标体系等方面的创新与改革，来给予配套和支撑。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必将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④

高质量发展要求深化综合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加快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因此，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需要在收入分配体制、财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深化改革，使高质量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全体人民。“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着力解决好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等民生问题，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依法引导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⑤

3.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

① 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② 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③ 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④ 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⑤ 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复兴的关键一招。”^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②。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③需要强调的是，全面深化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胆探索要求勇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探索适应新时代特点的发展路径，推动体制机制的持续优化，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坚守原则要求在探索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遵循客观规律，保持战略定力，确保各项实践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目标。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贯彻的重大原则之一，“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重点领域改革，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准确把握人民的真实需求和期望，及时回应民众关切，切实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这不仅要求我们充分激发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主动精神，还要从人民的整体、根本及长远利益出发，科学规划和推动改革。同时，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必须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为全体人民创造更加平等的机会与条件。这一制度框架的核心目标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成果能够公平地惠及每一个公民，切实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最持久的制度保证。“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⑤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更高要求相比，从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宏伟目标出发，我国在国家治理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任务和严峻挑战。制度的成熟与定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持续演化、动态调整的过程。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样是一个渐进过程，随着社会实践的深入和时代变革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必然需要不断优化、调整和提升。现有的制度架构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和完善，而面对新兴领域的复杂挑战和实际需求，制度创新与填补制度空白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⑥。为此，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紧紧围绕这一总目标，深入推进改革创新，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生机活力的制度保障。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2页。

③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④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29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84页。

⑥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8页。

二、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理论要义

1. 方向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改革方向不仅决定着改革实践的成败，更深刻影响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发展。正确的改革方向能够有效引导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相反，方向偏离或失误则可能导致资源错配、社会矛盾激化，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和国家发展停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①，“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②。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核心议题。在经典作家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自觉地有计划的社会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区别在于“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③。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难题。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重视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到党的十八大后将改革目标确定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④，为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⑤，我国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我国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研究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环节是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⑥。首先，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深化公有制经济改革，一方面，明确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的基本原则，“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⑧；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实施分类改革，以明确市场化改革目标和客观分类标准为基础，在不同领域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具体形式。同时，推动国资监管从“管资产”向主要“管资本”转型，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效率显著增强，国资系统监管企业的资产总额和利润总额分别从2012年的71.4万亿元和2.0万亿元，增长至2023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页。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④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2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76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7页。

⑦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6页。

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76页。

年的317.1万亿元和4.5万亿元，规模实力和效益质量大幅提升^①。其次，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2014年国务院出台“鼓励社会投资39条”，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促进民间投资26条”，2017年国办出台“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10条”，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28条”，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支持民间投资发展21条”，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民营经济31条”，这一系列政策为民营经济规范和健康发展营造了更加理想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亮明态度、决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既要‘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又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②。

2. 重点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在我国整体改革中，经济体制改革居于重心和中心地位，对其他领域的改革起着牵引作用，必须牢牢抓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一重点任务，协同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实现各个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相互促进、互为支撑^③。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要求，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之一。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形象地表达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④，并强调“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⑤，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生产关系要容纳生产力性质所决定的物质技术要求，使生产力所蕴含的生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原有的生产关系和体制机制往往会暴露出不适应的矛盾，成为制约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打破这些体制机制上的束缚，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其能够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匹配，从而释放经济发展潜力。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就是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这是由以下几方面所决定的。首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为了突出加快经济建设这一主题。“全会决定用‘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突出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⑥其次，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为了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也突出强调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这就是说，要把握住我国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重点是发展。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紧紧扭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73页。

② 习近平：《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求是》2023年第4期。

③ 参见丁任重、郭义盟：《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政治经济学评论》2024年第6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⑥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0页。

就能为其他各方面改革提供强大推动，影响其他各个方面改革相应推进。”^①最后，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是为了推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完善‘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②

3. 开放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改革的深入推进必然要求开放水平的同步提升，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塑造改革所需的外部环境与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开放水平的提升不仅为改革提供更加广阔的资源和市场支撑，还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强化改革的动力。

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其关键在于通过深化制度型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高效衔接与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科学认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主动作为、善于作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③一方面，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首要目标是提升国内大循环中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为内需驱动的经济提供体制保障。国内大循环是中国经济从外部驱动向内生动力转型的战略选择，其关键在于通过提升国内供给质量和需求匹配效率，实现供需之间的动态平衡。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制度支持，包括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加强产权保护与竞争政策，降低国内市场壁垒等。通过这一体制建设，国内市场规模效应与产业配套能力得以全面释放，为内循环的高效运行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在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上，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运作机制在于，通过国内市场的强大内需带动全球市场的深度整合，而全球资源、技术和资本的引入又反哺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体而言，新体制通过优化贸易和投资环境、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改革试点，构建更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合作网络。在这一过程中，国内企业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互动，不断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国内国际双循环并非简单的内外循环叠加，而是通过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支持，实现在资源、市场和技术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内外循环互促共生的有机整体。这不仅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也为全球经济复苏和治理体系改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④。这一要求源于全球经济格局和国际规则体系深刻变革的现实背景，也是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型的必然选择。制度型开放不同于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强调通过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要素的对接与创新，提升开放的体系化和可持续性。首先，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能够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主动权。通过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和绿色经济规则，可以提升我国经济制度的透明度和规范性，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创造良好环境。其次，制度型开放推动了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制度型开放以规则先行为导向，通过自贸试验区、自贸港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推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市场主体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7-48页。

②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9页。

③ 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

④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人民日报》2024年10月30日。

最后，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能够构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制度性竞争优势，从而巩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关键地位。

4. 方法论：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方法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整体性、联系性和动态性思维的继承与创新。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系统观念强调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复杂性与规律性，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①。

系统集成就是从整体的角度强调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工协作和协调统一，实现系统的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集成，体现于中国共产党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将全球治理置于整体视角下进行全局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为全球发展与治理提供了创新性范式；体现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坚持系统观念提出明确要求，要“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②。第一，处理好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体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和协调互动的必然性。要通过增加国家财富和提升创新能力，为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供支撑，同时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健全公共服务提升人民福祉，促进社会稳定与公平，为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核心在于政府与市场各自发挥其独特功能的同时，实现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从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的整体福祉。一方面，政府应尊重市场规律，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必要干预；另一方面，市场无法触及的领域需要政府进行适度补位，以确保社会整体效益最大化。要以制度设计为核心，通过合理界定权责边界，平衡政府调控与市场自发作用之间的张力，做到“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第三，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关键在于平衡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与分配结果的正义性，构建二者之间的动态协调机制。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侧重点不同，这一命题更注重分配结果的正义性与社会福祉的提升，而非资源配置主体的机制协调。要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在初次分配中的效率优势、政府在再分配中的公平职能和道德引导在三次分配的补充功能，建立一种既激励创新、释放活力，又保障社会和谐、增进福祉的协调机制。第四，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核心在于平衡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创新动力与制度规范。一方面，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和优化政策环境，既划定行为边界，又创造活力释放的空间；另一方面，推动秩序本身的动态调整，以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需求的变化，避免规则僵化对创新的束缚。最终通过规则的激励功能和创新的秩序引导，实现活力与秩序的良性互动。第五，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核心在于在发展中守住安全底线，在安全保障下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是安全的基础，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应对多元化安全挑战的物质保障；安全则是发展的前提，是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必要条件。忽视安全会导致发展环境的恶化，甚至威胁发展成果的持续性，而片面追求安全则可能抑制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从而影响长远发展。唯有在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中，构建协同推进的长效机制，才能实现经济繁荣与社会稳定的有机统一。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页。

三、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实践指向

1. 根本保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①，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取决于党，取决于党的领导^②，只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为改革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科学的战略指引和高效的组织动员能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③。坚持党的领导，既要牢牢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确保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和高效的决策执行，又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强化自身建设，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第一，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完善重大经济政策决策机制和协调推进机制，把握改革方向，确保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第二，健全党对经济领域的领导体制，通过加强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完善地方党组织的经济治理职能以及优化党的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嵌入方式，确保党的领导能够在关键领域发挥实效，推进市场化与政府治理的有机结合。第三，增强党在改革过程中的组织动员能力，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推动政策落地、深化结构性改革和促进公平竞争中的示范作用，同时通过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凝聚各方共识，化解利益矛盾，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稳定的社会和市场环境。

2. 制度保障：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破立并举、先立后破，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⑤。第一，要加强顶层设计、总体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⑥。在进一步推进制度建设中，通过明确目标、重点和路径，确保制度安排紧密围绕国家发展需求和社会治理实际，避免局部利益导向或短期行为对整体改革目标的偏离；通过统筹协调各领域制度建设，打破部门壁垒和领域分割，形成政策间的内在一致性和协同性，以增强制度体系的整体效能和改革的综合效果；强化动态评估机制，通过对制度实施效果的监测和反馈，及时识别问题并进行优化调整，以确保制度体系对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和对长期目标的稳定性。第二，要注重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破和立的辩证统一，破立并举、先立后破，该立的积极主动立起来，该破的在立的基础上及时破，在破

① 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4月14日。

② 参见孙蚌珠：《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5-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12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6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88页。

立统一中实现改革蹄疾步稳”^①。必须明确改革目标并确保“立”先行，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提前规划改革路线图和制度框架，确保新制度能够填补旧制度被打破后的空白，避免出现制度真空；要加强制度的配套性和可操作性，通过试点改革、渐进推进等手段，避免“一刀切”的改革方式，确保“立”与“破”之间的衔接与平衡。第三，要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根本制度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和根本特征，具有方向性、基础性、全局性特征。要筑牢党的领导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是根本制度的内在规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重要制度是各个领域的基础性制度，要在实践基础上推动制度创新，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3. 关键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着力形成新型生产关系

新质生产力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之举。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作为先进的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与之相适应、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②。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③。第一，构建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动力保障。要优化创新资源配置，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打破资源配置中的行政壁垒，促进科研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高效流动，确立企业和科研机构创新主体地位，增强创新驱动的内生动力；优化科研与产业的联动机制，打破科研与市场之间的壁垒，推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建立更加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构建创新生态环境，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创新法律框架和优化社会资本的激励机制，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法治与市场环境。第二，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强化国家层面的战略引领和协调机制，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明确创新重点领域，统筹科研、产业、资本和人才等资源，集中攻克关键技术难题，避免资源分散和重复建设；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和制度保障，通过引进和培养创新型人才，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为创新活动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持和激励动力。第三，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力度，激励创新和技术投资；优化市场准入制度，降低创新型企业的进入壁垒，推动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发展；强化公平竞争制度，通过完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确保市场环境公平，促进创新型企业的健康发展；健全社会信用制度，通过建立信用评价体系和共享平台，提升市场透明度和信任，促进资源的高效配置；强化监管制度，通过灵活的监管机制保障市场秩序，防范市场风险，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等新兴领域。

4. 战略支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切实保障国家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国家安全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前提和保障，经济安全是维护国家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

①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凝心聚力推动改革行稳致远》，《人民日报》2024年10月30日。

② 习近平：《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2024年第11期。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11页。

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①。经济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占据基础性地位，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支撑。它不仅关乎国家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而且是保障政治安全、社会稳定、文化繁荣及国家战略自主的前提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②。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经济安全的内涵已超越传统的经济运行稳定，涵盖了关键技术、战略资源、金融体系、产业链和供应链等多维度的安全保障，成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③。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需要从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金融风险防范和粮食安全等多个关键领域着手。第一，强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要推动关键产业和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过度依赖，提升产业链的韧性。同时，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确保能源的多元化供应和稳定性；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战略储备，提高应对国际市场波动和突发危机的能力。第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能力。通过加强资本市场透明度、完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和提高监管科技化水平，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市场稳定运行；针对互联网金融、数字货币等新兴领域，加强监管和风险防控，避免潜在风险对经济安全的冲击。第三，保障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要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加强种子研发和自主创新，特别是在关键粮食品种的育种技术上，推动基因组学和分子育种等前沿技术的应用，提升种子品质和抗灾害能力，确保种子供应的自主可控，从源头保障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加强耕地保护政策，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耕地的综合利用率，鼓励节水灌溉和农业绿色发展，提升耕地生产力和环境可持续性；推动农业科技创新，特别是通过智能化、精准化农业技术，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粮食生产效率；建立健全政策保障体系，完善粮食生产和流通体系的扶持政策，合理调控粮食市场，确保农民收入和粮食供应稳定。

参考文献：

[1] 黄刚：《习近平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重要论述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0期。

[2] 秦宣、俞佳奇：《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逻辑理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9期。

[3] 王小广：《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原则及重点任务——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人民论坛》2024年第15期。

[4] 刘嗣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方法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内涵要义与多维价值》，《改革》2023年第1期。

[5] 杨瑞龙：《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研究》，《经济学家》2022年第2期。

[6] 周利生：《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形成与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

（编辑：张建刚）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00-201页。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7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0页。